

媒介、文化、身份

——麦克卢汉思想映照下的当代媒介与文化转型分析

【奥】克里斯蒂娜·夏希特纳 唐涛译

(奥地利克拉根夫大学)

〔摘要〕 麦克卢汉认为,任何媒介或任何技术都将改变人类活动的规模、进度或形态^①。在此意义上,麦克卢汉强调的是媒介本身的文化意义,而非媒介传达的内容。这为传统上认为媒介非中立的媒介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事实上,媒介是对应于特定社会的文化模式的,因此此社会中的媒介的形成与分布也就不是偶然的。文章将首先具体探讨麦克卢汉此观点在当今世界的现实意义:面对跨越国家及社会制度的数字媒介全球化传播及应用,以及由此带来的媒介化进程,媒介生态的发展趋势是什么?接下来,作者尝试联系文化和公民来对当代数字媒介传递的信息作出解读。

〔关键词〕 媒介;文化;身份;转型;麦克卢汉

〔中图分类号〕C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16)03-0033-07

麦克卢汉在与埃里克·诺顿(Eric Norden)的访谈中解释说,“我是想绘出新的地形图,而不是标出旧的地标”^②。正如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指出,麦克卢汉所做的是从文化角度研究媒介的一把钥匙^③,同时笔者也想强调,这是因为麦克卢汉突破了已有的媒介研究领域,将目光放在了媒介自身的未来发展。

一、理解本文之重要的麦克卢汉理论观点

(1) 媒介即信息^④;

(2) 所有媒介都是人的延伸^⑤;

(3) 电子媒介构成文化的整体转型^⑥;

(4) 电子媒介构成价值观和态度的转型并产生新的人的延伸^⑦。

第一个观点,“媒介即信息”。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和技术引起社会变革,而其传达的信息则是此变革在规模、速度或类型上的反映^⑧。例如,自动化技术的出现就是为了消除日常工作的繁琐;Web 2.0则实现了全世界的网络化沟通。在此意义上,麦克卢汉强调的是媒介本身的文化意义,而非媒介传达的内容。这为传统上认为媒介非中立的媒介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事实上,媒介是对应于特定社会的文化模式的,因此,此社会中媒介的形成与分布也就不是偶然的。

麦氏的第二个观点“媒介是人的延伸”,认为其是“人的器官、感觉或功能的强化或放大”^⑨;并由此

〔收稿时间〕2016-04-20

〔作者简介〕克里斯蒂娜·夏希特纳,女,奥地利克拉根夫大学教授。

〔译者简介〕唐涛,男,山西大同人,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① Marshall McLuhan, *Understanding Media*, Die magischen Kanäle, 1968, pp.22.

② Martin Baltes & Rainer Höltzschl, *Absolute Marshall McLuhan*, Freiburg, 2011, pp.6.

③ Mark Poster, “McLuhan und die Kulturtheorie der Medien”, Derrick De Kerckhove & Martina Lecker & Kerstin Schmidt eds., *McLuhan neu lesen*, Bielefeld, 2008, pp.182.

④ Marshall McLuhan, pp.21.

⑤ Marshall McLuhan, pp.43.

⑥ Martin Baltes & Rainer Höltzschl, pp.10.

⑦ Martin Baltes & Rainer Höltzschl, pp.10&49.

⑧ Marshall McLuhan, pp.22.

⑨ Martin Baltes & Rainer Höltzschl, p.8.

引起个体的变化进而改变个体的环境^①。电视延伸了我们的视觉,汽车延伸了我们的活动能力,互联网则延伸了我们的交际半径。另两个涉及文化与个体改变的观点可以由前两个观点得出。媒介技术依赖于社会文化,确切地说依赖于特定的社会价值、规范、阐释框架和行为类型,而所有这一切在文化规制由媒介传递时又实现、强化与区分了不同的文化模式。计算机技术已经强化了诸如加速、恒久进入以及效率等概念,使之与之前的缓慢、闲散以及周到相比明显高出一筹。在麦克卢汉看来,这些文化转型是与“人的深远且长久的改变^②”相对应的因为人必须妥协于由媒介实现的文化模式;他们不得不或采纳、或避开或修改这种模式,这必然对人的自我观念有所影响。

麦克卢汉曾作出预测,“新技术一旦进入社会,每项社会制度都将充分吸收其影响^③”。麦氏认为语音字母表的创制即为此进程的开端。媒介专家弗里德里希·克罗茨(Friedrich Krotz)和安德里亚斯·海普(Andreas Hepp)用“媒介化”这个概念来描述当代媒介转型与文化的关系。用克罗茨的话说,媒介化意味着“由于因具体目的而产生的新媒介的出现和建立以及与此同时发生的旧媒介的有意使用,社会内部的交流产生了改变,而个体的由交际构成的社会现实,即文化与社会、身份与日常生活也产生改变”^④。媒介化是一个根本的社会文化转型过程,这个长期的过程在不同文化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发展,并在当代与其它如全球化以及个体化等重大进程相关联。安德里亚斯·海普则在时间、空间以及社会层面上对电视和互联网的媒介化作了区分^⑤。从时间上来说,越来越多的技术媒介可被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以互联网为例,人们可以全天24小时地上网遨游。从空间上来说,媒介可在更多的地点获取。移动设备使得用户几乎在任何地点都可获取信息或被联系到。最终,媒介

化的社会维度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比以往更多的社会现实由媒介的使用为特征反映出来,而媒介已经大大延伸出家庭、休闲、就业以及政治的范围。媒介化的概念显示出与媒介生态学的相通之处,两种方法都试图探究文化、技术以及人的交流三者之间的关系^⑥。

回到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信息”的观点,我想对其在当今世界的意义作具体讨论。面对跨越国家及社会制度的数字媒介全球化传播及应用,以及由此带来的媒介化进程,媒介生态的发展趋势是什么?接下来我将尝试对文化和此主题相关的数字媒介的时代意义作出回应。

二、媒介发展趋势的文化意义

我将提出两种媒介发展趋势,其正对西方世界的文化价值和规范体系产生根本挑战,并可能在将来在各个方面上加剧生活情境的多元化和边界的消解。我的论证将会包括我的“主体建构与数字文化”研究的成果和案例,此研究基于我与来自6个欧洲国家、4个阿拉伯国家以及美国的网络参与者的访谈。

(一) 生活情境的多元化

电影、无线电广播、电话以及电视曾扩展了我们的经验世界。如约书亚·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指出:因为电子媒介使我们能够远距离沟通,它们确保了我们所居住的地方现在是个“不会大受限制并且独一无二的环境”^⑦。数字媒介把空间和生活情境的多元化增加了好几倍。作为通用媒介,它们能承载所有种类的内容。在数字空间里,我们可以工作、学习、娱乐、谈情说爱、交流以及分享信息^⑧。以个人媒介如照片、电影、音乐和广播日益融合为特

① Ibid.

② Ibid.

③ Martin Baltes & Rainer Höltzschl, pp.11.

④ Friedrich Krotz, *Leben in mediatisierten Gesellschaften. Kommunikation als anthropologische Konstante und ihre Ausdifferenzierung heute* in: Pietraß, Manuela & Rüdiger Funiok eds., *Mensch und Medien. Philosophische und sozialwissenschaftliche Perspektiven*, Wiesbaden 2010, pp.106.

⑤ Andreas Hepp, *Mediatisierung und Kulturwandel. Kulturelle Kontextfelder und die Prägekräfte der Medien*, in: Maren Hartmann, & Andreas Hepp eds., *Die Mediatisierung der Alltagswelt*, Wiesbaden: VS Verlag, 2010, pp.66.

⑥ Zhou Min, “Toward a Global Ecology of Media: A Transcultural Analysis of America and China’s Approaches to Media ‘Ecolog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unpublished paper, 2013.

⑦ Joshua Meyrowitz, *Überall und nirgends dabei. Die Fernseh-Gesellschaft* 1, 1990, pp.10.

⑧ Christina Schachtner, “Im Gespinnst der Netze”, *Medien Journal*, Vol. 37, No. 4 (2013), pp. 20.

征的媒介聚合给我们提供了传送文本、影像以及声音的空间。

作为网络媒介,它们给了引领我们从一个数字空间到下一个数字空间的链接、路径和流动性,甚至使同时在不同渠道操作变成可能。网络结构发挥了联接而不是分裂的作用。不像有着有限网格的渔网或发网,相互重叠、相互交织的数字网络因技术发展及网络参与者的互动而处在永恒的流动状态。联系到电视,麦克卢汉已经指出这种发展的开端,他认为电视让我们觉得我们“与一切事物产生联系,任何事都可在同一时刻发生(……)”^①。数字空间的多元化可以由网络参与者的多元化存在反映出来,“主题构建与数字文化”研究表明了这一点。该研究指出:青少年通常使用不止一个网络,他们同时关注多个博客,自己也常常拥有不止一个个人博客。一名19岁的网络参与者用下图画出了她在网络中的多元化存在。



图1 数字网络中的多元化存在
(德国某19岁的网络参与者)

在画中,此网络参与者将自己描绘成分散在几个数字空间,像一个既各自独立又没有空隙而完美结合在一起的拼图板。在不同的数字空间中,一个人生活的不同方面可被检测,人际关系的不同网络

可被维系,不同的身份可被显示。在屏幕上,这些个人数字空间甚至是一个挨着一个可视化的。谢莉·图科尔(Sherry Turkle)在她的美国访谈对象身上也观察到这个现象,她用这样一句话总结“她(访谈对象)能够在屏幕上将自己生活的不同方面像打开窗户一样公开给别人”。一位来自上海的21岁学生的图画同样说明了这个问题,画中她几乎同时身处不同的数字空间。这就表明我们经验世界中不同空间是相互转换和重叠的,我们面对的是交织在一起的不同空间以及来自不同知识和生活领域的叠加在一起的刺激、需求和价值观,而这一切都没有国界的区分的^②。



图2 数字媒介带来的生活情境的多元化
(中国某21岁网络参与者)

作为跨越所有界别的媒介,数字媒介使得文本和影像在全世界不同的生活模式以及价值规范体系之间交叉往返流动^③。麦克卢汉也预见到了这种发展趋势,他指出:“借助广播、电视和计算机,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全球剧院,同一个世界,同一个事件”^④。

文化流动^⑤在数字媒介语境下表现为信息、影像和交流的运动,是和全球化进程相互关联的并同时

① Martin Baltes & Rainer Höltzschl, pp.29.

② Christina Schachtner, pp.22.

③ Sabine Hess & Ramona Lenz, “Kulturelle Globalisierung und Geschlecht – ein Buchprojekt”, Sabine Hess, & Ramona Lenz eds., *Geschlecht und Globalisierung. Ein kulturwissenschaftlicher Streifzug durch transnationale Räume*, Königstein i. Taunus, 2001, pp.19.

④ Martin Baltes & Rainer Höltzschl, pp.40.

⑤ Ulf Hannerz, “Flows, Boundaries and Hybrids: Keywords in Transcultural Anthropology”, Rogers, Alisdair ed., *Working Paper Series, WPTC-2K-02, Transnational Communities Programme*, Oxford University, <http://www.transcomm.ox.ac.uk/working%20papers/hannerz.pdf>, accessed 17.08.2014.1997.

伴随着资本、商品和人员的流动^①。“流动”的比喻可以让我们在程序的层面上认识文化。文化流动远不限于从西方工业化国家到南半球国家,这个过程也可以是反向的,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这是一个“全球文化互动”^②。

以这个流动的比喻为基础,文化不是一个“封闭的球体”^③;从哲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Wolfgang Iser)的观点来看,它是可渗透的;它完全开放于由媒介维系的文化流动产生的外部冲击。韦尔施已经观察到跨文化的倾向,这是一个不同文化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的发展趋势^④。社会人类学家乌尔夫·翰纳兹(Ulf Hannerz)则强调跨文化过程令人担忧,其伴随着“不确定性、(……)误解以及损失”^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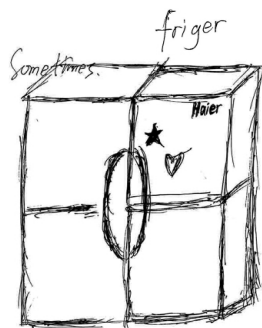
(二) 边界的消失

媒介带给我们的第二个信息是:边界正在被消解;这在联系到数字媒介时尤其有争议。这样的边界并不独立于生活情境的多元化而存在。如前所述,生活情境的多元化包含情境的延伸以及重叠,而情境的重叠是与边界的消解相伴相生的。按我对麦克卢汉著作的理解,这个信息补充了他的思想框架。媒介正在剧烈地改变着我们的日常生活,甚至改变着我们对自身的理解。我将从四个方面探讨边界如何在媒介的作用下消解:公众与个人、工作时间与空闲时间、虚拟与现实以及人与技术。

1. 公众与个人之间的边界消解

公众生活与个人生活的分离在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看来是西方资产阶级社会的必要构件^⑥。而媒介在动摇这种差异的诸因素中起了主要作用。西方国家电视上出现了比以往更多的挑战观众或参与者让其暴露隐私的节目。伴侣、性及婚恋等关于私生活的问题变成了媒体上的策划事件或公众话题^⑦。Facebook, YouTube 和 MySpace 之类的

数字平台诱使用户将自己的个人相片和视频发布给全世界看。媒体使用的技术不但使模糊公众与个人的界限变为可能,并使之成为一定的必然。至今尚无标准来重新定义公众与个人空间的关系。就像我们在“主体建构与数字文化”研究中看到的,个人只能任其发展并常常感到不安全。



Sometimes



When I use wechat/QQ,
just like a little girl.

图3 有时她知道冰箱里有什么,有时(她知道)

她的感受。隐私在网上都是可见的。

(中国某23岁网络参与者)

2. 工作时间与空闲时间之间边界的消解

数字网络使工作者在工作时间和地点的选择上更加灵活,由此工作时间和空闲时间的差别变得不再那么固定。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唯利是图的雇方不再信奉福特主义和泰勒主义,两者都严格区分受雇工作和个人生活时间并把工作定义为首先是生意,从而设想出来生产与再生产之间的一个严格的空间区分^⑧。越来越多的职业不再有严格的工作时间和空闲时间的区分,工作者现在就面对这种灵活性:可能在家中的客厅、在咖啡馆、在机场或是度假期间。在

① Christina Schachtner, "Cultural Flows und virtuelle Öffentlichkeiten. Die Rolle digitaler Medien in transkulturellen/transnationalen Diskursen", *Medien und Kommunikationswissenschaft*, No. 4 (2012), pp. 536.

② Andrea Harmsen, *Globalisierung und lokale Kultur*, Eine ethnologische Betrachtung, 1999, pp.95.

③ Wolfgang Iser, "Auf dem Weg zur transkulturellen Gesellschaft", *Paragrana* 10 (2) (2001), pp.259.

④ Wolfgang Iser, pp.263.

⑤ Ulf Hannerz, p.6.

⑥ Jürgen Habermas, *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 Frankfurt a. Main, 1990, pp.268.

⑦ Karin Jurczyk & Oechsle Mechthild eds. *Das Private neu denken*, Erosionen, Ambivalenzen, Leistungen, Münster, 2008, p.8.

⑧ Anne Von Streit, *Entgrenzter Alltag - Arbeiten ohne Grenzen? Das Internet und die raum-zeitlichen Organisationsstrategien von Wissensarbeitern*, 2011, pp. 24.

需要作出决定要保留、接受或是拒绝何种边界的时候,受访者再次无能为力,只能任其发展。可能的情况是工作时间与空闲时间边界的消解尤其在西方工业化国家被看作一个新的现象并在哪里被认作是一个问题;我在上海期间的观察似乎表明在这样的程度上这种严格的区分并不真实,至少对中国人口的特定部分来说。

3. 虚拟与现实之间边界的消解

跨国界的数字媒体应用意味着我们日益面对虚拟与现实之间越来越模糊的界限。让我用下面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你在西安某所大学透过你办公室的窗户望向窗外,看着太阳落下。你此时正在和世界其它地方的同行参加一个视频会议,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办公室,你也可以透过他们办公室的窗户看到天空中不同位置的太阳。这些其它地方的太阳有什么特点?你感受不到它们的温暖,它们也照不亮你的办公室,但这能让它们的真实性有丝毫减损吗?

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已经联系电视论述了媒介表征现实的问题,她观察到现实和虚拟之间的竞争:虚拟趋向于替代现实^①。鲍德里亚因其论证的二元论视角受到批评,而我们对一个有着鲜明区分、严格分割和纯粹二分世界的愿景也正是此二元论的反映^②。后续推荐考虑到作为现实之一的物理现实,也承认虚拟是现实之一种^③。然而,相比物理世界,媒体的虚拟世界有其特殊性质:很少有面对面的冲突,不是所有的感觉都能被处理,虽然在如医学或电脑游戏中有尝试去克服这些差异。但是此刻电子媒介的虚拟世界仍让我们面对诸如真实性、可靠性以及归属感的问题。

4. 人与机器之间边界的消解

在把人与机器的差别付诸检验方面,数字技术比以往任何技术都进一步。我们在语言和认知层面上与其互动;可以说,当我们键入命令而它经常以令人吃惊的方式回应的时候,我们就是与之交谈,就像和一个人一样。我们的想法、梦想和目标,像是我们对

完美、无暇以及永生的渴望,都可以由这项技术实现。所有这一切都因为技术是人造的产品,它为社会的质量标准 and 人的欲望所影响^④。与数字技术的互动影响引领我们进入一个混合的世界,其中人与机器的区别越来越模糊。



图4 一台人机混合体:当人的思想与技术逻辑融合
(德国某30岁程序员)

(三) 媒介化与身份

在勾勒出结构层面的几个发展趋势之后,我想来探讨下个人层面的几个发展趋势,而这正是麦克卢汉思想的前沿内容。媒介引起了生活情境的扩散和重叠,这样的文化结构变化带来了新的体验和认识,而这一定影响到我们的意识和自我概念。麦克卢汉预测新的电子文化将会使我们被新的信息模式淹没,进而造成身份危机^⑤。这里我们不能确定这样的危机是否已经发生,或哪一代人和/或社会阶层会被牵涉其中,但我们可以观察到:作为在全球化和媒介化社会里的争议现象,身份已经成为众多学科的普遍话题。我现在让三个有代表性的学科,即文化研究、社会心理学以及社会学,对当下的身份话题做一表述来证明此点。

按照克里斯·巴克(Chris Barker)的说法,“我们

① Jean Baudrillard, *Agonie des Realen*, Berlin, 1978, pp.46.

② Stephan Münker, “Was heißt eigentlich ‘virtuelle Realität’? Ein philosophischer Kommentar zum neuesten Versuch der Verdopplung der Welt”, Stephan Münker & Alexander Roesler eds., *Mythos Internet*, Frankfurt a. Main, 1997, pp.117.

③ Ibid., pp.119.

④ Bruce Mazlish, *Faustkeil und Elektronenrechner*, Die Annäherung von Mensch und Maschine, 1998; Christina Schachtner, “Mensch und Maschine”, *Nachdenken über ein ambivalentes Verhältnis*, in: *Jahrbuch für Bildungs- und Erziehungsphilosophie*, No. 5(2003).

⑤ Martin Baltes & Rainer Hölschl, pp.26.

是如何成为我们现在这样的”是文化研究的中心主题^①。确实,在文化研究中,身份并不被假设为“确定要被拥有或被发现”^②;巴克建议把身份理解为一个固定于“有条件的、特定历史和文化社会建构”之中的过程^③。如巴克指出,一个全球化和媒介化的社会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文化资源,这促成了“去中心的主体,一个有多重变化身份的自我”的产生。社会心理学家海尔格·比尔登(Helga Bilden)给出了类似的观点。她同样观察到社会中的混杂话语,无处不在的媒体造成了新的文化自我形式。自我所处的文化及情境是混合和处于变动的,新自我声音的多样性特征正是和个体自身感知位置的多维度相一致的^④。社会学家扬·耐得温·皮特艾斯(Jan Nederveen Pieterse)使用全球多元文化的概念来解释当代社会的特征^⑤。基于此,他像巴克一样发现了更多的自我来源,这就造成了“身份变得更加不固定和有更多回路”^⑥。这些理解身份的方式——现在和将来的——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假设:对应于生活情境的多元化,自我也是多元化的;自我是由许多拼块组成的,因为自我利用了大量的文化动因并像文化一样被认为是一个过程。

如何评判这些对身份的不同理解呢?是放在相互冲突的一争高下的自决和他决之间吗?有观点强调这是有利条件,一个去中心化的、发出多种声音的、不断发展的自我会给我们新的获得自由的机会。也有人持怀疑观点,例如社会学家安德里亚斯·拉克维茨(Andreas Reckwitz)相信:现代人为了获得认可不得不屈服于新的文化标准^⑦。在他看来,这最终会导致现代人只是获得了表面上的自治。对马克·波斯特来说,电视、纸媒和互联网在构建主体和定义身份意义上像是学科制度^⑧。如何理解人与媒介之间的

确定性关系是这些怀疑观点的基础。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的参与者-网络理论代表了这个问题的中间立场。按他的观点,个体是他与其他人与事物联系形成的网络的一部分,这其中就包含媒介技术。他认为媒介和技术都是系统或事件的参与者^⑨。他同时指出,我们赋予媒体技术越多的功能,结果媒体技术就越像我们自己,它就更加代替,虽然不直接决定,我们的行动和思想^⑩。但是总有某种东西当我们思考的时候它也思考,当我们行动的时候它也行动;我们就像集体一样共同行动^⑪。人类在媒介的帮助下变得更加多样化,这是一个织出有着人与非人参与者的网络的过程。拉图尔反对臣服于客体力量的技术决定论;但他也反对高估人类自身的构建能力^⑫。参与者-网络理论是和“部分自治体”模式一致的^⑬,后者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坚持了自己的思想和行动。部分自治的可能性是因为随着媒介的先验性使用,我们总是有可能以不同方式和/或为不同目的去使用它们^⑭,并且因为人类是有反思能力的,这就使得我们能够对媒介的发号施令保持怀疑。

另一方面,让我们再次回到麦克卢汉的观点,当新的媒介出现时,为保护自己,人们的反应常常是“一种奇怪的自我催眠、麻醉昏迷形式”,并且“不能清醒地意识到发生了什^⑮”。在媒介化的社会里,我们无能为力去做出反应。理解媒介,如麦克卢汉所言,对于我们维系和巩固参与者的地位来说极端重要。这一点对于普通个人和组织或公司来说都是一样的。学术界一直都被赋予使命来构建知识从而促进对当代媒介和文化景象转型的理解,并促进行动策略的形成以守卫公民的部分自治。

(责任编辑:马胜利)

① Chris Barker, *Television, Globalization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Buckingham/Philadelphia, 1999, p.2.

② Chris Barker, p.7.

③ Ibid.

④ Chris Barker, pp.198.

⑤ Jan Nederveen Pieterse, "Global Multiculture. Cultures, Transnational Culture, Deep Culture", Claudio Baraldi & Andrea Borsari & Augusto Carli eds., *Hybrids, Differences, Visions: On the study of Culture*, Aurora, CO, 2010, pp.11.

⑥ Ibid., p.9.

⑦ Andreas Reckwitz, *Subjekt*, Bielefeld, 2008, pp.14.

⑧ Mark Poster, pp.187.

⑨ Bruno Latour, *Eine neue Soziologie für eine neue Gesellschaft, Einführung in die Akteur-Netzwerk-Theorie*, Frankfurt a. Main, 2007, pp.124.

⑩ Ibid.

⑪ Nina Degele & Timothy Simms Degele & Simms, "Bruno Latour. Post-Konstruktivismus pur", Martin Ludwig Hofmann & Tobias F. Korta & Sibylle Niekisch eds., *Culture Club, Klassiker der Kulturtheorie*, Frankfurt a. Main, 2004, pp. 268.

⑫ Nina Degele & Timothy Simms Degele & Simms, pp.274.

⑬ Karin Harrasser, *Körper 2.0, Über die technische Erweiterbarkeit des Menschen*, Bielefeld, 2013, pp.73.

⑭ Karin Harrasser, pp.116.

⑮ Martin Baltes & Rainer Hölschl, p.8

Media ,Culture , Identity — An Analysis of Current Shifts in the Media and Cultural Landscape in the Spirit of Marshall McLuhan

Christina Schachtner , Translated by TANG Tao
(Genfu University , Austria)

Abstract: According to Marshall McLuhan , the message of any medium or any technology is the change of scale or pace or pattern that it introduces into human affairs (McLuhan 1968 , 22f.) . In this respect , McLuhan did not focus on the contents of media but on the cultural implications of the medium , introducing a new perspective to media studies which purports that media are not neutral. Instead they correspond to the cultural code of a society. As a result , the kinds of media which are developed and distributed in a particular society are not due to chance. In this article I would like to discuss what McLuhan's thesis means in concrete terms in today's world. Which developmental trends are emerging in the face of mediatization processes which are moulded by the global spread and use of digital media across countries and social settings? In the rest of the paper I will attempt to respond to current messages in the digital media which relate to culture and the subject.

Key words: medium; culture; identity; shift; Marshall McLuhan